

辽金燕京城研究史

——城市考古方法论的思考

刘 未

内容提要 辽金燕京城研究史由遗迹实录、舆地考证、历史地理、城市考古四个前后相继的学术传统构成。作为最早开展复原研究的古代城市之一,百余年间呈现出多达三十种复原图,且迄今仍存争议。对这一学术史案例的分析,旨在检讨城市考古方法论,总结如何合理运用各类文献、地图以及调查、发掘资料,对古今重叠型城市进行复原研究,并对城市考古的解释模式进行反思。

关键词 辽金 燕京城 辽南京 金中都 城市考古

综观中国城市考古史,辽金燕京城是一个颇为特别的案例,它是最早采用科学手段开展复原研究的古代城市之一,但却没有哪一座古代城市像它这样呈现出形形色色的复原图,百余年间竟达三十种之多,并且迄今为止仍存有较大争议。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在系统梳理辽金燕京城研究史的同时,进一步检讨城市考古方法论,总结如何合理运用各类文献、地图以及调查、发掘资料,对古今重叠型城市进行复原研究,并结合城市史、建筑史和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对城市考古的解释模式进行反思。

一 学术史概述

根据学术传统的差异,可以将辽金燕京城研究史的回顾分为四个主题来进行,从时间角度来看,各主题之间大体先后相继,但也略有交叠。

(一) 遗迹实录

元大都建成之后,金中都作为南城继续沿用,其城垣在明代初年尚保存完好。洪武元年(1368)八月,徐达令叶国珍实测北平南城,周长5328丈^①。永乐二十一年(1423),杨士奇往白云观郊游,土城西北隅犹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三四,页620—621,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勘影印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1962年。

存，其记云¹：

出平则门，望天王寺、白云观，在城西南五六里。……稍前度石桥，入土城，望白云观可一里。土城者，辽金故城也。其遗址独西北一隅间存，亦间有可登眺者，然不及登，径趋观中。

迨成化初年，渐遭破坏，其东垣虽仍残存，然时人已不能确指来历，刘定之记梁氏园一带所谓萧太后城者即属其例²：

梁氏园，在今京师西南五六里，其外有旧城。旧城者，唐藩镇、辽金别都之城也。元迁都稍东，于是旧城东半遂入于朝市间，全无迹可见。而西半犹存，号为萧太后城，即梁氏园所在也。……其城仅存土尔，甃皆为人取去，今取犹未已。其土皆真黄土，人取之和煤炭以烧，亦有即之作墓者，以其犹高坚也。予往游之日，去清明节未久，插棘挂纸，近远在目。

至于城壕，或隐现于郊野，崇祯时喜游览者曾有所注意，但未辨明性质³：

白云观，元太极宫故墟。出西便门，下上古隍间一里，麦青青及门楹者，观也……西南五六里，为萧太后运粮河，泯然湮灭，无问者。

埋没于阡陌，康熙时辑稗史者予以记录，试图推测时代⁴：

京师二月淘沟，秽气触人，南城烂面衒衒尤甚，深广各二丈，开时不通车马。此地在悯忠寺东，唐碑称寺在燕城东南，疑为幽州节度使城之故壕也。

（二）舆地考证

有意识地对辽金燕京城的历史加以考证，始于清初孙承泽约顺治间完成的《春明梦余录》，注意以唐辽旧寺作为故城位置参照⁵：

旧幽州城在今城西南。唐藩镇城，即辽金故城也。隋之天宁寺，旧在城中，今在城外矣。悯忠寺有舍利记，唐景福元年建，其文曰：大燕城内，地东南隅，有悯忠寺，门临康衢。悯忠寺旧在城中东南，今在城外西南僻境矣。

康熙间朱彝尊撰《日下旧闻》，广辑燕京文献⁶，据康熙二十年（1681）西安门内所发现唐贞元十五年

〈1〉（明）杨士奇：《郊游记》，《东里续集》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册1238，页380，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2〉（明）刘定之：《游梁氏园记》，《呆斋续稿》卷一，《四库存目丛书》影印明万历二十二年补刻本，集部册34，页184，齐鲁书社，1997年。

〈3〉（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三《城南内外》“白云观”，页137—138，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4〉（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七《獭祭奇·天时》，《四库存目丛书》影印清康熙三十五年休宁赵氏刻本，子部册155，页260，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

〈5〉（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城池》，页18，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

〈6〉（清）朱彝尊撰、朱昆田补：《日下旧闻》卷一《世纪》；卷三《宫室》“辽金”，清康熙二十七年秀水朱氏六峰阁刻本。朱彝尊所引与辽金燕京营建有关文献重要者如：《禁扁》、《辽史》、《上契丹事》、《大金国志》、《金史》、《揽辔录》、《北辕录》、《玉堂嘉话》、《南迁录》、《奉使行程录》等。朱昆田补遗部分重要者有《金虏图经》。

(799)卞氏墓⁴¹，推断唐辽故城在其西南五里，并略述金元明营建沿革⁴²：

金拓南城时，妆台在城之东北。至于元之中都，则今德胜、安定、东直三门外皆城中地，而白马庙、琼华岛、妆台、太液池、柴市、悯忠寺、大悲阁，咸在南城。迨徐武宁又改筑，缩其北五里，废光熙、肃清二门，规制差隘。永乐中重拓南城，然悯忠寺、大悲阁仍限门外。盖都城凡数徙，坊市变置，代有不同。

乾隆间以朱氏书为蓝本修《日下旧闻考》，补充了《元一统志》、《析津志》两项重要文献⁴³，且对辽金故城范围有较为细致的辨析：

辽金故都在今都城南面，元代尚有遗址，当时多谓之南城，而称新都为北城。自明嘉靖间兴筑外罗城，遗迹遂渐湮废，其四至已不可辨。今即前人志乘、文集、碑刻所记，准以现在地面，参稽互审。如悯忠寺、昊天寺，在今宣武门南，与广宁门相近，而元人皆称为南城古迹。又今城外白云观西南有广恩寺，即辽金奉福寺，距西便门尚远，而金泰和中曹谦碑记谓寺在都城内。又金天王寺，即今天宁寺，在广宁门外稍北，而《元一统志》谓在旧城延庆坊内。又今琉璃厂，在正阳门外，而近得辽时墓碑，称其地为燕京东门外之海王村⁴⁴。又今黑窑厂，在永定门内先农坛西，而其地有辽寿昌中慈智大师石幢，亦称为京东。又《图经志书》载都土地庙在旧城通玄门内路西，通玄乃金都城北门，而都土地庙今在宣武门外西南土地庙斜街。由是观之，则辽金故都当在今外城西，以至郊外之地。其东北隅约当与今都城西南隅相接。

又论辽金燕京扩建云：

据此条⁴⁵，燕京旧城周二十七里，至金天德三年展筑三里，见《析津志》所引金蔡珪《大觉寺记》。合计之，共周三十里。此皆指都城言之。至《大金国志》所称周七十五里者，则指外郭而言，犹今外城之制也。

这些论断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较大影响。

较此稍晚，赵翼在朱彝尊基础上，对辽金元明燕京营建作补充考证⁴⁶，据《金史》蔡珪、刘頔两传所记城东及南苑迁汉唐墓葬事，推断海陵王广燕京城，于辽故城东南两面均大为增广。

〈1〉 志文曰：“贞元十五年岁次己卯七月癸亥朔，夫人寝疾，卒于幽州蓟县蓟北坊，以其年权窆于幽州幽都东北五里礼贤乡之平原。”

〈2〉 朱氏所述大致不错，惟误以为琼华岛、太液池咸在南城。

〈3〉 (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二九《宫室》“辽金”；卷三七《京城总纪》，页404—428、585—596，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4〉 指乾隆三十五年(1770)发现的辽保宁十年(978)李内贞墓，其志文云：“保宁十年六月一日薨于卢龙坊私第，年八十。以当年八月八日葬于京东燕下乡海王村。”见(清)钱大昕：《记琉璃厂李公墓志》，《潜研堂文集》卷一八，《嘉定钱大昕全集》9，页287—289，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5〉 指许亢宗《奉使行程录》所云：“燕山府周围二十七里，楼台高四十尺，楼计九百一十座，池堊三重，城开八门。”

〈6〉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校正》卷二七《辽燕京》、《金广燕京》、《元筑燕京》、《明南北京营建》页592—596，中华书局，1984年。

光绪间，缪荃孙等修《顺天府志》，哀辑前人之论撰所谓辽金元明故城故宫考⁴¹，不但缺乏新意，反而增添谬误，其论辽金燕京扩建云：

按金之都城，因辽之旧，周二七里。至天德三年，东南二面展筑三里，与四子城相属，外城包之，广七十五里。

稍后，震钧于所著《天咫偶闻》一书中附《辽金元明都城考》⁴²，自称：

自朱氏《日下旧闻》及吴氏《宸垣识略》，皆不能详指辽金元故城所在，故考古者遂茫无头绪，直等诸殷土芒芒而已。余尝于暇日走都城西南，遍搜遗迹，归而发书证之，如是者非一日矣。一旦天启其衷，恍有所悟，亟援笔而成是图。推之于辽金元明四史，旁及诸家之说，广征博考，无不悉合。今而后如出喉舌，大快人意，亟登之此书，以资佐证。

震钧试图将遗迹踏查与文献考证相结合，并绘“辽金元明都城合图”〔图一〕将结论予以直观表现，确属创举。利用南北烟阁胡同、老墙根等地名追寻辽城线索，也颇具见识。然受四子城及七十五里大城说之诱导，将八里庄西、永定门外土岗均指为金城，误认为“盖金之城，其西北直包今钓鱼台，东北包今西苑，而西南包今丰台，东南抵南苑矣”。

民国间，汤用彬编《旧都文物略》，全袭震钧之说，以为“辽金元明都城变迁图”⁴³。

（三）历史地理

少为人知的是，早在同光之际，俄人贝勒士奈德(Emil Vasilievitch Bretschneider)就对北京旧城进行了精细的勘查，并在《北京及其周边的考古与历史研究》一书中绘制了金中都、元大都位置复原图〔图二〕⁴⁴。贝氏注意到鹅房营和白云观一带存在土城遗迹，推测其分别为金中都西南垣和北垣，还将东垣推定在法源寺以东、宣武门以西一线。

贝著英文版发行之后，德人莫伦道夫(O. F. von Möllendorff)对该书提出增订意见⁴⁵，重点补充了金中都城垣实地勘测的结果，除贝氏提到的地段之外，新增西城垣的北段和东城垣的南段，并提供了残存城垣的长

〈1〉 (清)洪良品纂，缪荃孙辑：《辽故城考》、《金故城考》、《元故城考》、《明故城考》；《辽故宫考》、《金故宫考》、《元故宫考》、《明故宫考》，《光绪顺天府志》卷一《京师志》一《城池》；卷三《京师志》三《宫禁》下，页4—14，37—78，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后收入缪荃孙《艺风堂文集》卷二，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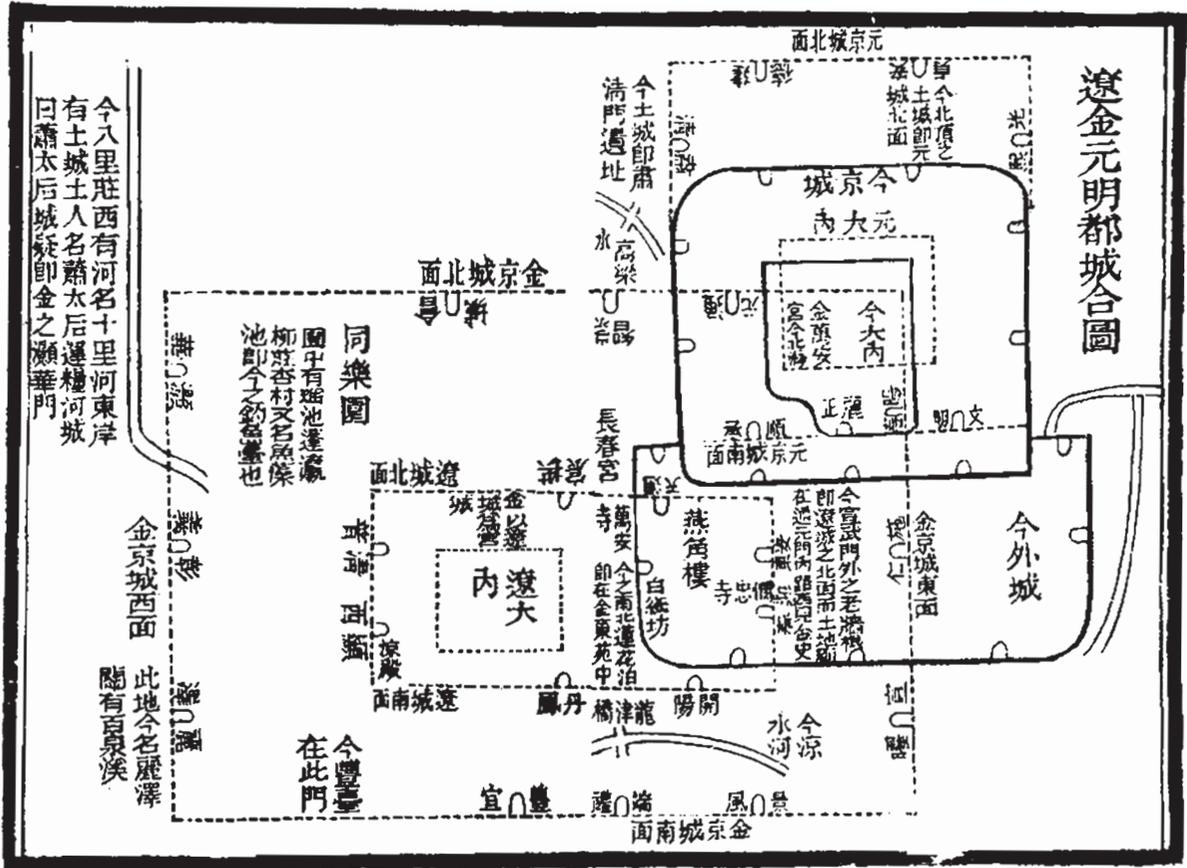
〈2〉 (清)震钧：《辽金元明都城考》，《天咫偶闻》卷一〇，清光绪三十三年甘棠转舍刻本。

〈3〉 汤用彬：《旧都文物略》页4，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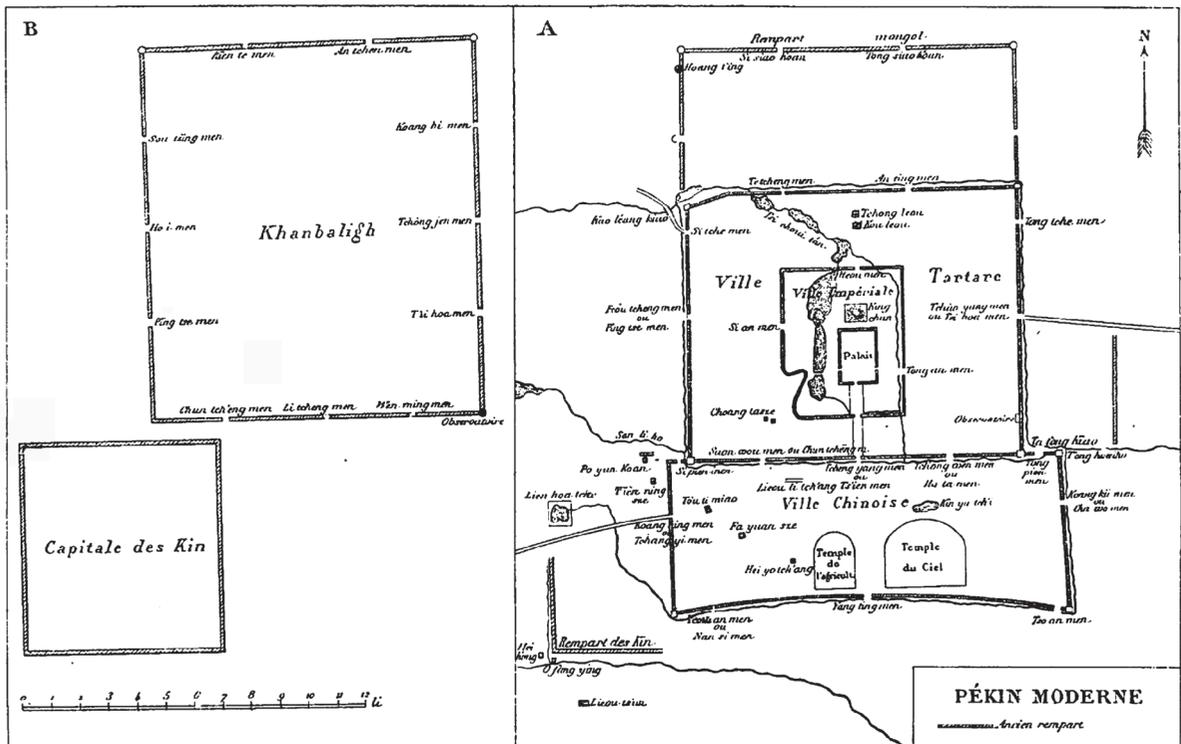
〈4〉 E. Bretschneider,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Researches on Peking and Its Environs",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6, 1875. E. Bretschneider,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Researches on Peking and Its Environs*,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6. E. Bretschneider,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et historiques sur Pékin et ses environs*, Paris: Ernest Leroux, 1879.

〈5〉 O. F. von Möllendorff, "Ancient Peking: Addenda et Corrigenda to Dr. Bretschneider's pamphlet inscribed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Researches on Peking and Its Environs", *The China Review*, Vol. 5, No. 6, 1877, pp. 383—3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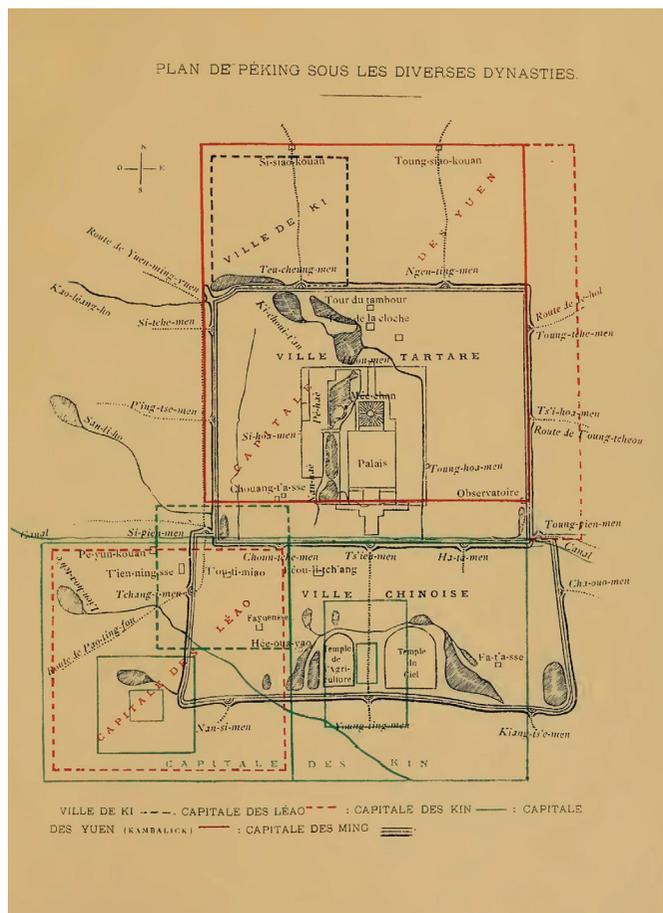
〔图一〕震钧1907



〔图二〕貝勒士奈德1879



[图三] 樊国梁1897



度。据此推定金中都南北长4905米，东西宽4453米¹，周长18716米。后来的考古调查证明，这一勘测结果是相当准确的！

二十年后，法人樊国梁(Bishop Pierre-Marie-Alphonse Favier)出版了著名的《北京：历史和描述》一书²，附有彩色套印的历代北京城位置复原图〔图三〕。其中以鹅房营、白云观土城为辽南京³，又将其东垣推定于琉璃厂、黑窑厂以西一线。另将金中都范围向东大大拓展，东垣抵明清旧城东垣一线(法塔寺东)，而金宫殿则置于永定门南北中轴一线。

尽管樊氏复原图误差较大，但却影响颇广，民国间西人所撰介绍北京历史风物之书纷纷予以采纳。如马特罗列(Claudius Madrolle)《中国北方、长江流域与朝鲜》⁴、裴丽珠(Juliet Bredon)《北京纪胜》⁵、喜仁龙(Osvold Sirén)《北京的城墙和城门》⁶、阿灵顿(L. C. Arlington)、路易森(William Lewisohn)《老北京探故》⁷等。

又三十年后，法人普意雅(G. Bouillard)在《北平疆域沿革与城墙的简要说明》⁸一文中，对樊国梁的

复原图进行了一些修订〔图四〕，改正了辽南京北垣的位置，使之与唐幽州一致，将金中都东垣向内收缩至天坛与明清旧城东垣之间，另外还利用了东便门以外南北向土垣，虚拟了将明清旧城尽行包罗在内的所谓外城。这

<1> 文中误将东西长度数值印作4953，据南北长度及周长数值推算结果更正。

<2> Alph. Favier, *Péking: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Péking: Imprimerie des Lazaristes au Pé-T'ang, 1897. Alphonse Favier, *Péking: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Paris: Desclée, De Brouwer, 1902.

<3> 但所绘北垣位置误与明清旧城南垣相齐。

<4> Claudius Madrolle, *Northern China, The Valley of the Blue River, Korea*, Paris & London: Hachette & Company, 1912.

<5> Juliet Bredon, *Peking: A Historical and Intimate Description of Its Chief Places of Interest*, 2nd ed., Shanghai: Kelly & Walsh, Limited, 1922.

<6> Osvold Sirén, *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 London: 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 Limited, 1924.

<7> L. C. Arlington & William Lewisohn, *In Search of Old Peking*, Peking: Henri Vetch, The French Bookstore, 1935.

<8> G. Bouillard, "Note succincte sur l'histoire du territoire de Peking et sur les diverses enceintes de cette vill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1, 1929, pp. 39-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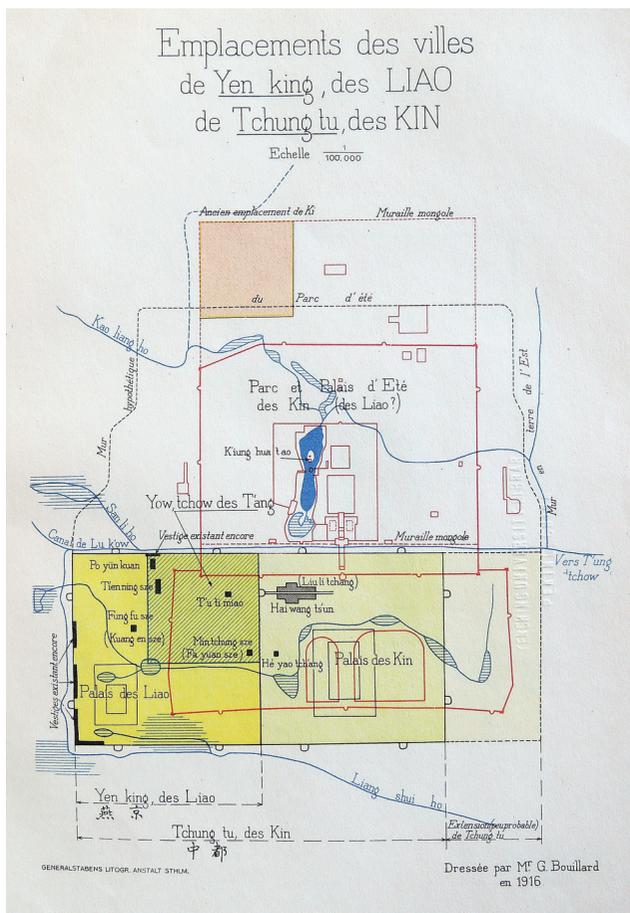
些意见后来被安藤更生所采纳¹⁾。

几乎与此同时，日中两国学者均推出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研究成果。那波利贞撰《辽金南京燕京故城疆域考》²⁾，在文中提出：

研究地理沿革时，文献之必要，自不待言；而与文献之研究并行，且更为必要者，是乃遗址之实地踏查研究。……本文主要之论述，系以遗迹之实地调查为基本，再酌用文献上研究结果之比较妥当者。以此作为学术上研究之方法。……凡欲为历史地理之研究者，必需要以科学方法绘制尺度确实之该地地图，自不待言。……考察辽金南京燕京之疆域时，最低亦要求五万分之一，若得一万分之一者尤佳，绘制详密确实之学术地图……本文所论即系根据此二万五千分之一北京郊垆地图³⁾，与民国二年内务部职方司制作实测北京内外城地图⁴⁾，将吾人实地踏查之结果记入后，再以之与文献及先辈学者之研究比较考核。

那波将文献记录、实地调查与地形图分析相结合，绘制了“辽金南京燕京故城疆域拟定地图”[图五]，认为唐幽州、辽南京、金中都范围渐次扩展，其论证依据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古代遗迹。将白云观西土阜认定为唐幽州西垣、烂缦胡同推断为唐幽州东垣；将凤凰嘴土城认定为辽南京西南隅；据琉璃厂出土李内贞墓志、观音庵所存慈智大师石幢，以及梁家园之萧太后城、黑阴沟、黑龙潭、梁园一带旧水道，将辽南京东垣拟定在南柳巷、麻线胡同、粉房琉璃街一线；依崇恩福元寺判断金中都东垣在崇文门外大街附近。二是历史地名。推测老墙根为唐幽州子城西北隅、魏墙角为辽宫城西堞角楼、燕角楼为辽皇城东北隅、会城门为金中都北垣、黄亭子为辽南京金中都西北隅。

〔图四〕普意雅19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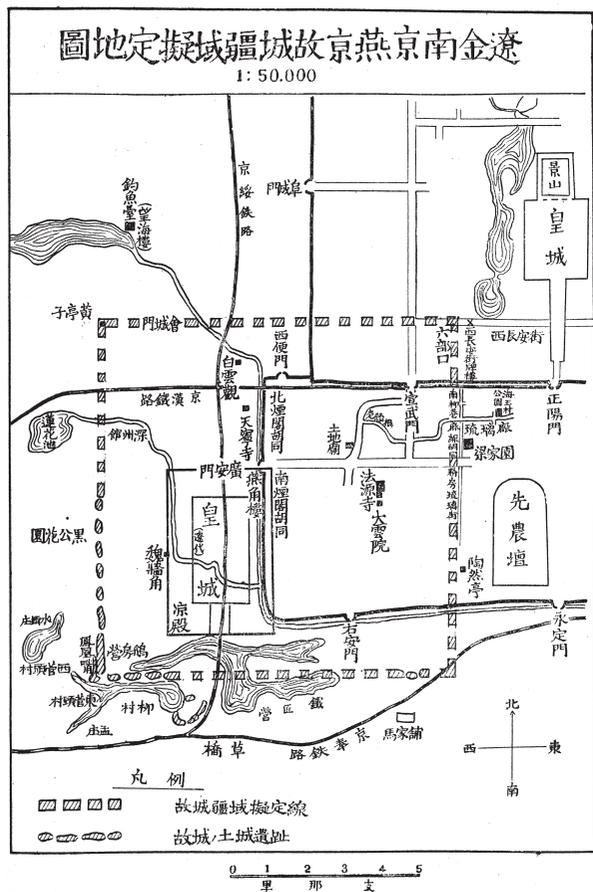
1) [日]安藤更生编：《北京案内记》“北京变迁图”，北京：新民印书馆，1941年。

2) [日]那波利贞：《辽金南京燕京故城疆域考》，《支那学论丛：高濂博士还历纪念》页455—515，东京：弘文堂书房，1928年。刘德明中译文载《中和》2卷12期，页53—67，1941年；3卷1期，页80—98，194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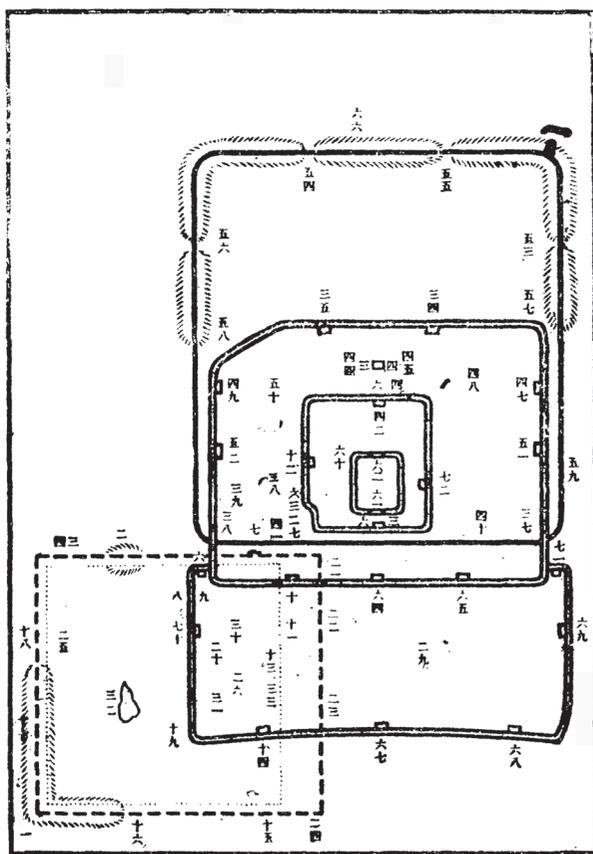
3) 指《北京及附近图》(Carte des Environs de Peking)，1比2.5万，普意雅测绘，1923年印制，首都图书馆藏图，影印本见王自强主编：《北京历史舆图集》第3卷，外文出版社，2005年。

4) 指《实测北京内外城地图》，1比8.5千，内务部职方司测绘处，1913年，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图，电子本见其网站<http://www.loc.gov/maps/collections/>。

〔图五〕那波利贞1928



〔图六〕奉宽1929



奉宽撰《燕京故城考》¹⁾，绘“唐幽州辽金元明京城分合图”〔图六〕，批驳震钧金中都七十五里大城说，认为金中都仅将辽南京东面予以扩展。推定辽南京范围：北垣在白云观后土城、会城门直道一带，会城门为通天门，拱辰门在闹市口街一线；东垣在烂面胡同；西南垣为鹅房营土城；皇城南界在菜户营南去周桥不远，燕角儿为皇城东北隅燕角楼。金中都范围：东垣在琉璃窑厂、梁家园、虎坊桥、潘家河沿、黑阴沟以西一线；彰义门在蝎子门至凤凰嘴一带，丽泽门在莲花池一带，颞华门在莲花池东北羊房店以南，丰宜门在右安门外关厢，宣曜门在南横街，阳春门在虎房桥大街，施仁门在虎房桥北城内板桥以南。奉宽所定金中都范围大致不错，并且首次根据现存街道等信息推断了城门的位置，尽管文献考证间有失误，但仍较前人更为广博精密。此后朱偁《辽金燕京城郭宫苑图考》²⁾、刘敦桢《书评〈辽金燕京城郭宫苑图考〉》³⁾、周肇祥《辽金京城考》⁴⁾、崇璋

〈1〉 奉宽：《燕京故城考》，《燕京学报》第5期，页883—911，1929年。

〈2〉 朱偁：《辽金燕京城郭宫苑图考》，《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6卷第1号，页49—81，1936年。附“辽南京析津府图”、“金中都大兴府图”，认为金中都都将辽南京向东南两面扩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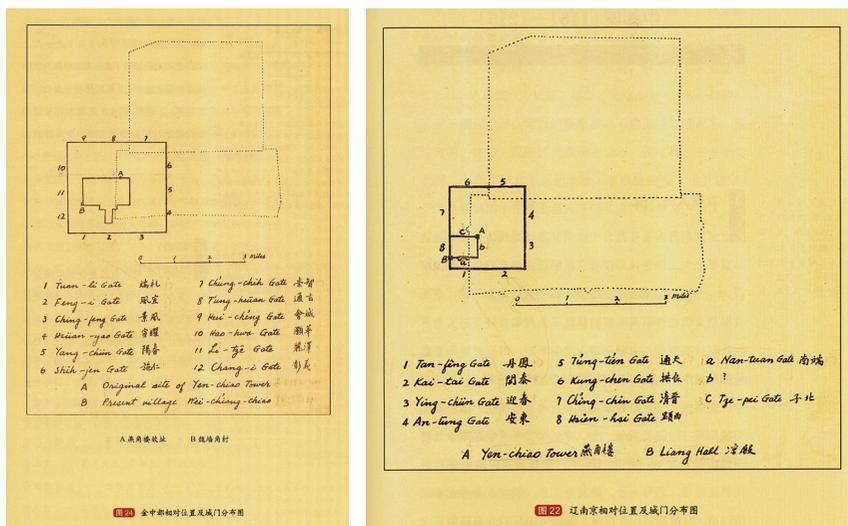
〈3〉 刘敦桢：《书评〈辽金燕京城郭宫苑图考〉》，《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6卷第4期，页165—168，1937年。据《续资治通鉴》所载海陵诏书，认为金中都向西亦有扩展。

〈4〉 周肇祥：《辽金京城考》，《中和》第2卷第11期，页4—11，1941年。据曹谦碑推断金中都西扩，凤凰嘴土城可能为金非辽。

《辽金土城谈》¹¹对辽南京如何扩展为金中都的问题也有所讨论，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

正式从现代历史地理学角度对辽金燕京城进行研究，实为侯仁之所著《北平历史地理》¹²，这是侯仁之在英国利物浦大学于194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也是“中国学者按照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规范，独立完成的第一部系统的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专著”¹³。书中对过往北京城研究文献

〔图七〕侯仁之1949



有详细的梳理¹⁴，论证中兼取了那波利贞和奉宽的正确之处，将辽南京和金中都的范围较为准确地分离开来，但城门顺序仍沿袭奉宽之误〔图七〕。与此前研究相比，重视河湖水系与城市的关系是其特点，但此时仍未及对城市内部的街道规划进行探讨。

（四）城市考古

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市政府文教委员会文物调查组配合陶然亭浚湖工程对金中都进行调查，周耿据之撰《金中都考》¹⁵。稍后又有朱偁《金中都宫殿图考》¹⁶，新利用《事林广记》乙集“京城之图”、“帝京宫阙”加以推测复原〔图八〕。

1957年，赵正之、徐莘芳等因研究元大都，对金中都遗迹进行了初步调查¹⁷。1958年，王璧文将其1943年勘测结果发表¹⁸，确认了凤凰嘴土城就是金中都西南隅〔图九〕。同年，阎文儒对金中都进行了较为

11 崇璋：《辽金土城谈》，《中和》第2卷第12期，页68—73，1941年。附“辽金土城想象图”，认为仅将辽南京东面扩展。

12 Hou Renzhi,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Peiping*, 1949(侯仁之著，邓辉等译：《北平历史地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

13 邓辉：《〈北平历史地理〉译后记》，侯仁之著，邓辉等译：《北平历史地理》页211，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

14 类似的工作也见于：Lin Yutang, *Imperial Peking: Seven Centuries of China*, Crown Publishers, 1961(林语堂著，赵沛林等译：《辉煌的北京：中国在七个世纪里的景观》，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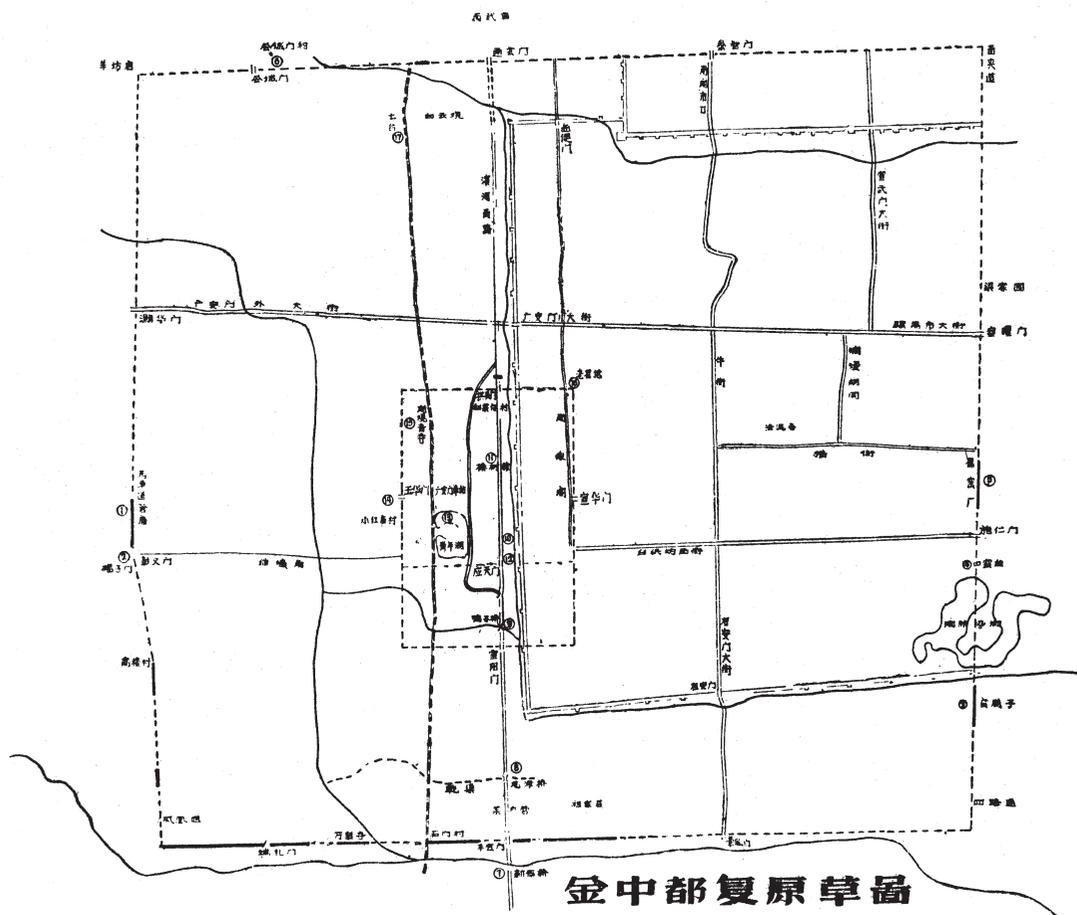
15 周耿：《金中都考》，《光明日报》1953年4月18日，《史学》副刊第2号。

16 朱偁：《八百年前的北京伟大建筑——金中都宫殿图考》，《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7期，页67—75。附“八百年来北京沿革略图”、“金故宫还原图”。

17 赵正之、舒文思：《北京广安门外发现战国和战国以前的遗迹》，《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7期，页74—75。

18 王璧文：《凤凰嘴土城》，《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8期，页60—61、50。

〔图十〕阎文儒1959



详细的田野考古调查¹⁾，城垣遗迹遗痕得到进一步确认，测得周长18690米，认定金中都东西南三面向外扩展，确定主要宫殿位置及中轴线，推测了几条主干大街的位置和内城的范围，对城内布局与里坊形态也略作推测〔图十〕。

1965—196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由徐莘芳主持对辽金燕京城展开正式的考古勘查，探明了外郭城、皇城和宫城的范围，城门的位置，以及主要宫殿、街道等遗迹²⁾。这项工作由于文革而中断，勘查结果也未能发表，但还是为后来复原图的编绘提供了基础资料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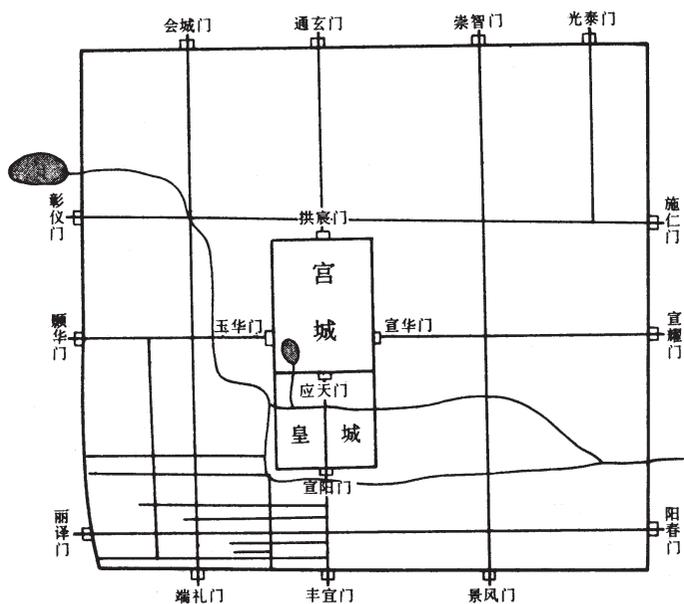
1980年代，随着《元一统志》、《析津志》辑本和石刻史料在辽金燕京城研究中的进一步运用，陆续涌现

〈1〉 阎文儒：《金中都》，《文物》1959年第9期，页8—12。附“金中都复原草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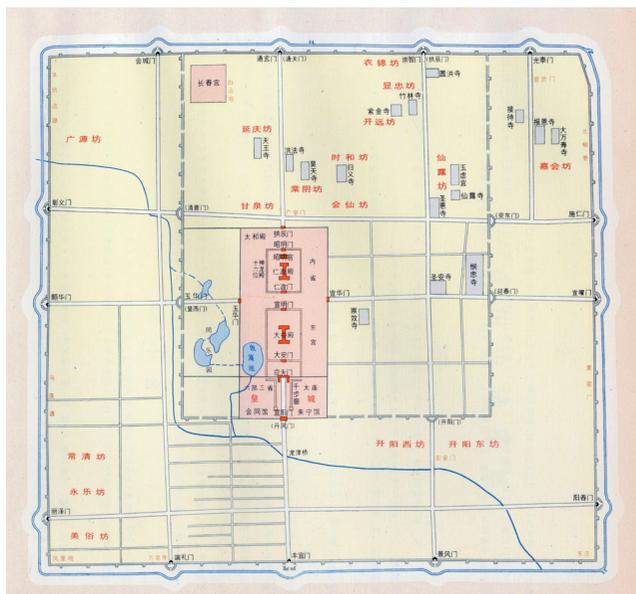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50—2010)历程》页187，2010年。1964年徐莘芳已开始主持元大都的调查和发掘工作，1965年8月，又着手拟定辽金燕京城考古工作计划。据《夏鼐日记》：1965年8月17日上午“徐莘芳同志来谈关于北京辽金城的工作计划”。1966年4月28日上午“徐莘芳同志来谈辽金北京城勘查情况”。页150、211，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3〉 侯仁之早年即据此绘制了“金中都城”图，见岳升阳主编：《侯仁之与北京地图》页32，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

〔图十一〕徐莘芳1986



〔图十二〕侯仁之1988



出了一批内容各异的复原图，如：王璞子(璧文)《辽金燕京城坊宫殿述略》^{〔1〕}附“辽金燕京城位置示意图”，徐莘芳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所撰《金中都》^{〔2〕}词条附“金中都平面示意图”〔图十一〕，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3〕}附“金中都”复原图〔图十二〕，于杰、于光度《金中都》^{〔4〕}附“辽南京城复原示意图”、“金中都城图”〔图十三〕，赵其昌《金中都城坊考》^{〔5〕}附“金中都城坊示意图”。这其中以徐莘芳的复原研究最具代表性，他更详细的复原成果还表现为拖延至近年方才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6〕}附“金中都大兴府城”复原图〔图十四〕。

1990年代以后新出现的几种复原图主要是对以上成果进行局部修正，如：齐心《图说北京史》^{〔7〕}附“金中都

〔1〕 王璞子：《辽金燕京城坊宫殿述略》，《科技史文集》第11辑，页20—43，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后收入《梓业集：王璞子建筑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

〔2〕 徐莘芳：《金中都》，《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页23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3〕 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出版社，198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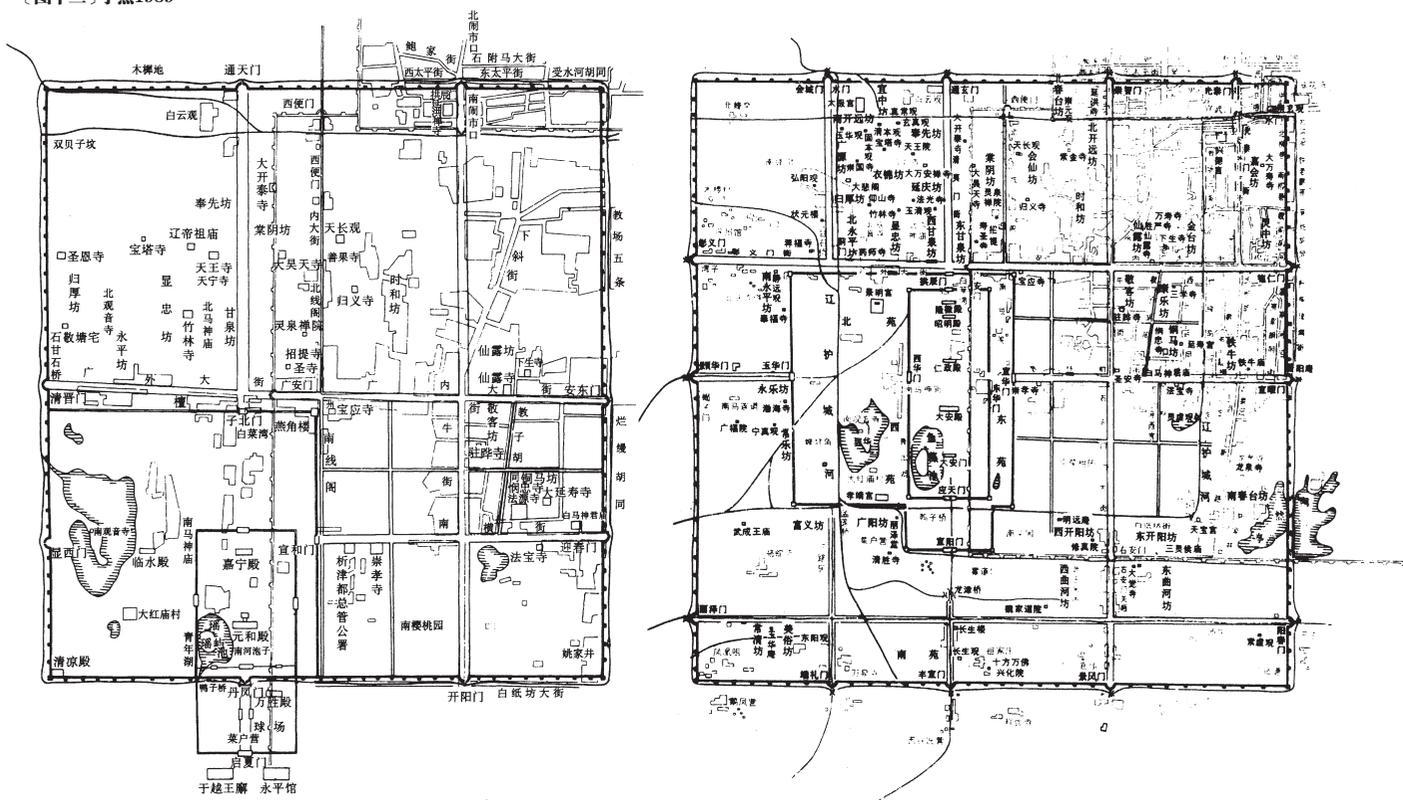
〔4〕 于杰、于光度：《金中都》，北京出版社，1989年。

〔5〕 赵其昌：《金中都城坊考》，《辽金史论集》第4辑，页312—338，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又刊《首都博物馆国庆四十周年文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后收入《京华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

〔6〕 国家地图集编撰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7〕 齐心：《图说北京史》，燕山出版社，1999年。

〔图十三〕于杰1989



城复原图”，侯仁之、岳升阳主编《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1〕}附“辽南京城图”、“金中都城图”〔图十五〕。唯最新发表的王世仁《金中都再认识》^{〔2〕}附“辽南京城复原推测图”、“金中都城复原推测图”，编绘另辟路径，以丈尺推街巷，与前人大不相同。

二 学术史评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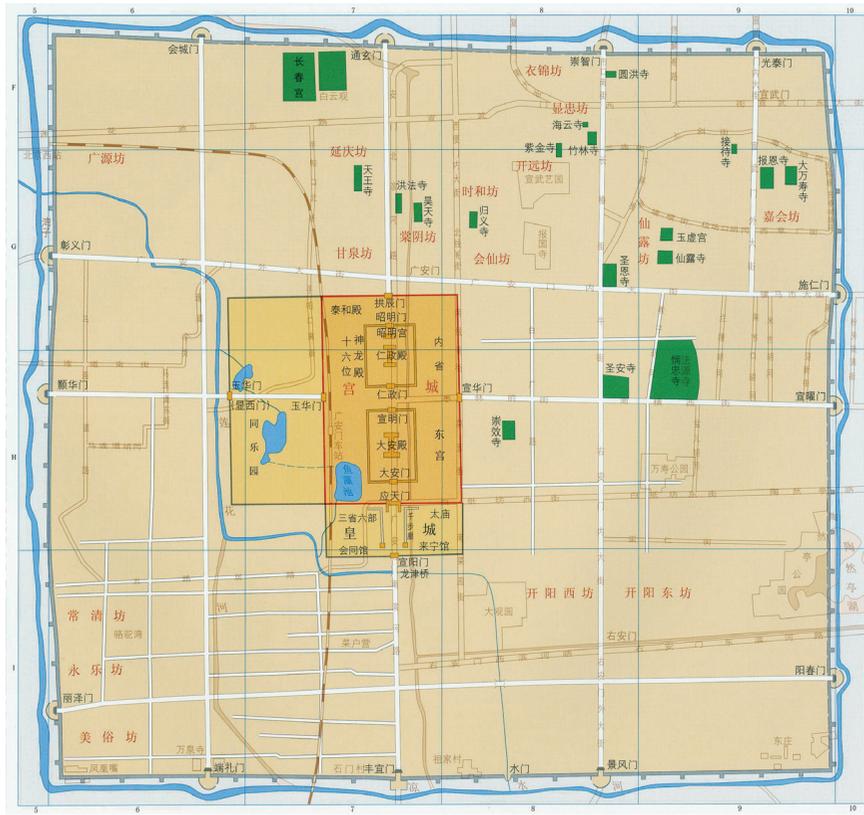
（一）文献运用

将辽金燕京城作为古迹来进行研究，发轫于清人的輿地考证，文献运用是其传统方法，至《日下旧闻考》，已将燕京城有关之大部分文献资料搜罗其中，为后来研究提供了很多线索。然据《大金国志》，以为金中都别有七十五里之外城，这一看法也长期误导后人。清末缪荃孙、震钧进一步将所谓四子城与七十五里外城之说相糅合，差误更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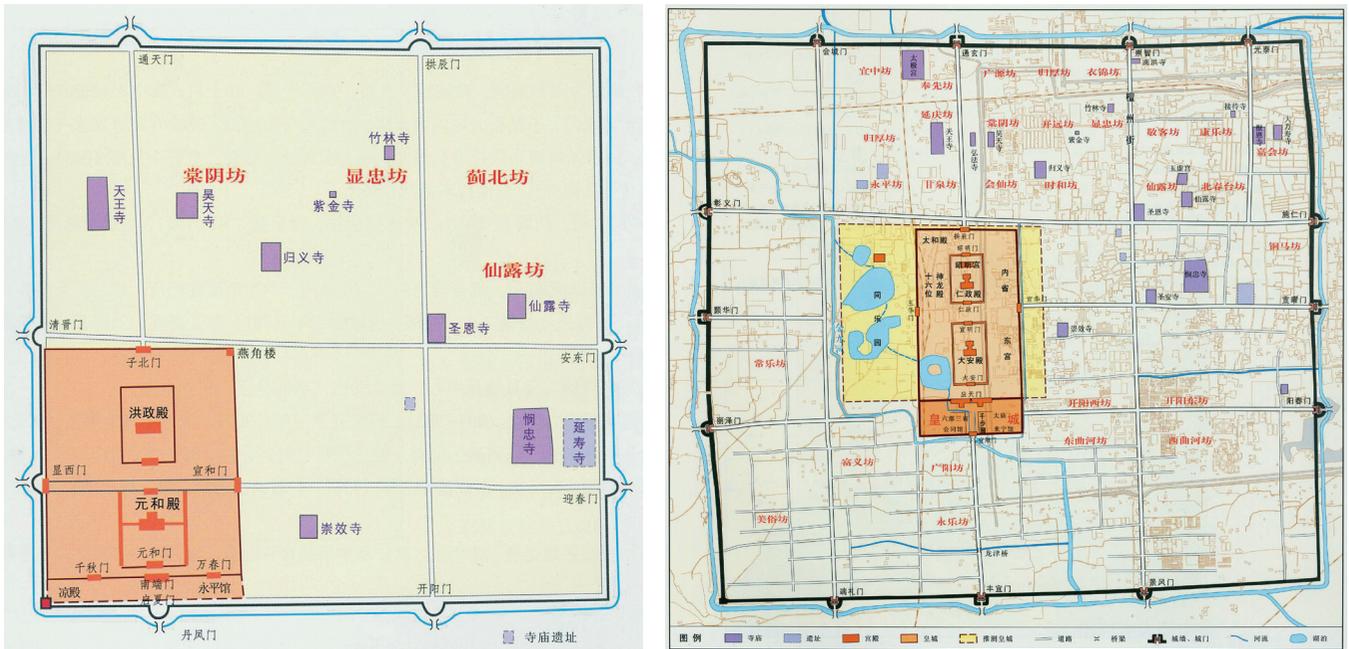
〔1〕 侯仁之、岳升阳主编：《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学苑出版社，2009年。部分复原论证参见岳升阳：《金中都历史地图绘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页81—89。

〔2〕 王世仁：《金中都再认识》，《北京文博文丛》2013年第2辑，页93—103。

〔图十四〕徐萃芳2012



〔图十五〕岳升阳2009



金中都七十五里外城说见于《大金国志》卷三三《燕京制度》，该书为元人钞撮杂编，此段文字乃于张棣《金虏图经》基础上改写而成，所谓“都城周围凡七十五里”即为妄增。而四子城之说见于《大金国志》二二《东海郡侯纪》上，实本自伪书《南迁录》。两书辨伪问题至1990年方由邓广铭、刘浦江论定¹¹，而稍早徐莘芳亦专辨其中有关金中都记载之误¹²。

对于辽金燕京城研究来说，两部元代志书《元一统志》和《析津志》的作用至关重要。然两书早年散佚，仅靠《永乐大典》收录传世，世人罕见，故《日下旧闻考》从中钞录的两书有关燕京城部分记载就成为研究者长期以来所能凭借的间接来源。两书辑佚工作的新突破源于《永乐大典·顺天府》钞本的利用。该书原为二十卷，今存其半，计有三本³。一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盛铎木犀轩旧藏缪荃孙艺风堂钞本⁴，为卷四六五〇至四六五七，顺天府七至一四；二为北平图书馆藏孙殿起通学斋旧藏钞本⁵，为卷四六五〇至四六五一，顺天府七至八；三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徐维则铸学斋旧藏钞本⁶，为卷四六五〇以前某卷。以此为主要依据，赵万里辑《元一统志》⁷，徐莘芳与北京图书馆分别辑《析津志》⁸。这些材料对1980年代以来辽金燕京城复原研究的深入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除早期方志辑佚以外，石刻史料和佛教经藏利用也是辽金燕京城研究中文献资料采集的重要途径。《日下旧闻考》即曾利用乾隆间海王村出土辽李内贞墓志推断燕京城范围。随着新中国考古工作的开展，北京地区唐辽金墓志出土渐多⁹，研究者便注意利用志文所记墓主居住信息来考订燕京城内里坊情况¹⁰，进而使复原图的编绘内容更为丰富。与墓志相类，房山石经和应县木塔刻经题记中也出现一些供养人居住信息，可以与前者补

〈1〉 邓广铭：《〈大金国志〉与〈金人南迁录〉的真伪问题两论》，《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刘浦江：《再论〈大金国志〉的真伪——兼评〈大金国志校证〉》，《文献》1990年第3期，页96—108。

〈2〉 徐莘芳：《金中都“四子城”说辨误》，《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第13、14期，页156—159。同年出版之于杰、于光度《金中都》一书，仍认为七十五里大城及四子城有可能存在（页60—64）。

〈3〉 《析津志》及《永乐大典·顺天府》成书及流传情况参见宿白：《〈大金西京武周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新发现的大同云冈石窟寺历史材料的初步整理》，《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6年第1期，后收入《中国石窟寺研究》页52—75，文物出版社，1996年。《居庸关过街塔塔考稿》，《文物》1964年4期，后收入《藏传佛教寺院考古》页338—364，文物出版社，1996年。《〈大金西京武周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后收入《中国石窟寺研究》页89—113，文物出版社，1996年。

〈4〉 《顺天府志》，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本，1983年。

〈5〉 《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影印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

〈6〉 此据徐莘芳1971年钞校本。

〈7〉 赵万里校辑：《元一统志》，中华书局，1966年。

〈8〉 徐莘芳钞校：《析津志》，手稿，1971年。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9〉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向南等：《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

〈10〉 鲁琪：《唐幽州城考》，《北京史论文集》第2辑，页107—123，北京史研究会，1982年9月。鲁晓帆：《唐幽州诸坊考》，《北京文博》2005年第2期，页72—79。陈康：《唐代幽州蓟城里坊、村乡之我见》，《北京文博》2006年第1期，页65—70、83。

充参证。其中不乏对街道里坊方位记录详细者，尤具参考价值。如：“大唐幽州蓟县界蓟北坊檀州街西店弟子刘师弘、何惟颇、侯存纳、贾师克等造大般若石经两条”⁴¹、“燕京檀州街显忠坊门南颊住冯家印造太平五年岁次乙丑八月辛亥岁次辛亥朔十五日乙丑”⁴²。这对于重新认识燕京城内街巷系统和里坊形态至关重要⁴³。

（二）遗迹调查

有意识地借助遗迹调查手段来对辽金燕京城进行研究始于震钧，“遍搜遗迹，归而发书证之”，并将所得成果以复原示意图的形式表现出来，就传统舆地考证方法来说，已是较高的水平。奉宽的研究路径与之相似，只是精密程度远远胜之。而贝勒士奈德以迄普意雅等西人，借助当时先进的测绘手段，又将调查所得表现得更为精确。

从方法论的自觉层面考虑，那波利贞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他不但明确提出历史地理研究必须将遗迹调查与文献分析相结合，并且强调在此过程中对科学绘制的大比例地形图的运用，而这一点恰恰是后来成熟期城市历史地理和城市考古研究所需凭借的重要基础⁴⁴。

采用田野考古手段调查辽金燕京城以阎文儒主持的工作为代表。此前他曾于1954年对汉魏隋唐洛阳城进行过比较详细的调查⁴⁵，而这实际上可以说是新中国城市考古的开端，对金中都的调查就是此类工作的延续。调查的内容包括城垣、城门、宫殿、街道等，并且重视借助地表采集遗物对相关遗迹年代与性质作出判断。另外，阎文儒在复原图绘制中还尝试将调查结果与《事林广记》所附金中都地图所提供的信息结合起来，这与此前调查洛阳城时注意对《永乐大典·河南府》和《唐两京城坊考》中地图的利用也是一脉相承的。

此后，徐莘芳主持的考古勘查工作更为深入，依靠钻探手段进一步确定了各类遗迹的范围与位置。但因尚无报告发表，详细工作情况不得而知。

（三）遗迹分析

若想较为全面地复原古代城市面貌，仅据地面所存零散的遗迹显然是难以做到的。那波利贞、奉宽在调查辽金燕京城城垣遗迹的同时，也试图通过历史地名的和现存街巷、河道所提示的线索来推断早期城垣、城门

〈1〉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金石组编：《房山石经题记汇编》页174，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编：《房山石经》第5册，页531，华夏出版社，2000年。《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四七一，编号二洞一一六。

〈2〉 山西省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应县木塔辽代秘藏》，文物出版社，2001年。

〈3〉 赵其昌：《辽代燕京之显忠坊、檀州街与市》，《首都博物馆丛刊》1982年第1期，后收入《京华集》，页111—117，文物出版社，2008年。赵文用到上述题记，然将檀州街误作东西向。

〈4〉 与那波利贞相似地将大比例地形图应用到古代城市调查和研究中的还有安藤更生，在20世纪40年代对唐宋扬州城所进行的工作，奠定了后来考古复原研究的基本框架，然而他对辽金燕京的分析却差强人意。参见〔日〕安藤更生：《唐宋时代に于ける扬州の研究》，《鉴真大和上传之研究》页323—381，东京：平凡社，1960年。

〈5〉 阎文儒：《洛阳汉魏隋唐城址勘查记》，《考古学报》第9册，页117—136，1955年。《隋唐东都城的建筑及其形制》，《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6年第4期，页81—100。文中所附城址平面图系以1比5万地形图为基础，并参照1比2千地形图绘制。

的位置，只是工作尚不系统。

认识到北京城古今重叠的特点，从遗痕分析角度来对城市形制与规划进行全面的复原，是赵正之于1950年代做元大都研究时所开创的。他借助大比例地形图和航空照片，将北京明清旧城内的街巷系统与明初废弃的元大都北部所存旧迹相比较，得出前者是元大都创建以来所沿袭重叠的论断，并且注意到元代平面规整的大建筑群废置后被明清时期杂乱的胡同所打破这一现象，由此对元大都的街巷系统和建筑群分布做出了比较系统的复原¹。由于赵的早逝，他未能对辽金燕京城展开同类研究²，但他对元大都复原的探索实际上构成了后来被称之为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最核心的方法论来源³。因此，宿白和徐莘芳对唐幽州、辽金燕京城的复原⁴，都特别注意对明清旧城范围内唐辽金历史遗痕的分析。

三 城市考古方法论的思考

（一）复原方法

关于城市考古复原方法，宿白、徐莘芳均有精辟的专题论述⁵，在前贤指引启发下，杨晔、蒋忠义、杭侃和笔者在对山西河北唐代城市、唐宋扬州城、中原北方地区宋金城市和南宋临安城进行复原研究之前对此也均有所说明⁶。因此，本文不再对具体的研究程序重复论列，仅以辽金燕京城研究史为例，对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略作解释。

1. 关于文献

城市考古工作通常要参考地方史研究成果，但为求简便此类论著在文献运用过程中，多以晚近刊行的方志和乡贤著述作为主要的资料采集线索，且往往缺乏独立的史料辨析工作，文献不辨史源，建置未理沿革，很容易将晚近产生的讹误带入研究中并引发混乱。

前文谈到的金中都所谓七十五里大城和四子城说对研究者造成的长期困扰，主要原因就是对《日下旧闻考》的文献辑录工作相信不疑，没有意识到辽金领域私家史料真伪杂糅的特点，从而影响到辽金城垣范围的

〈1〉 赵正之遗著、徐莘芳整理：《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科技史文集》第2辑，页14—27，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

〈2〉 赵正之在研究元大都城市规划时，对金中都实际也有所考虑。据1961年赵正之口授、徐莘芳笔录《记赵正之先生对元大都的一些主要论点》手稿，宿白问：“大都与金中都的关系：坊里之制与布局？”赵正之答：“大都坊里之宽与中都坊里遗迹相全，宫城偏处于皇城之东也同。”

〈3〉 徐莘芳：《元大都太史院址考》，《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上）》页345，文物出版社，2002年。

〈4〉 宿白并未对辽金燕京城复原做专门讨论，但在分析隋唐城址类型时，曾将幽州城作为一个重要实例，其基础实际上仍是首先对辽金燕京城的初步复原。参见宿白：《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提纲）》，《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页280、282，文物出版社，1990年。

〈5〉 宿白：《现代城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查》，《文物》2001年第1期，页56—63；徐莘芳：《现代城市中的古代城市遗痕》，《远望集》页695—699，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

〈6〉 杨晔：《山西、河北六座唐代州县城的初步考察》，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9年6月；蒋忠义：《隋唐宋明扬州城的复原与研究》，《中国考古学论丛》页445—462，科学出版社，1993年；杭侃：《中原北方地区宋元时期的地方城址》，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5月；刘未：《南宋临安城复原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6月。

正确推定。

与此相关的是，辽金燕京城的扩建问题也经历了较长时间讨论方才厘清。海陵广燕京，正史不甚详明，《日下旧闻考》据蔡珪《大觉寺记》判断，“至金天德三年，展筑三里”，因其未引原文，致使后来者产生不同引申。缪荃孙称“东南二面展筑三里”，朱偁袭之，而奉宽则称“仅展东面约三里”。但实际上《永乐大典·顺天府》引《元一统志》所录蔡文却是“天德三年，作新大邑，燕城之南，广斥三里”¹。刘敦桢以《续资治通鉴》海陵都燕京，诏有“广阡陌而展西南之城”语，判断西面亦曾扩展。而毕沅所录诏文实本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²，刘氏未及查考。侯仁之撰《北平历史地理》，综合以上各家所论，并注意到赵翼早已据《金史》蔡珪、刘頰两传指金中都东、南两面均有增广的意见，方才将此问题基本论定。此后，徐莘芳为准备辽金燕京城考古工作，曾预作《辽金蒙古时期燕京史料编年》³，又据《元一统志》“十方万佛兴化院”条⁴及《夷坚志》“燕王迁都”条⁵为金中都扩建增添新证。尽管不同时期文献获取的条件确有差别，但这段曲折的经历仍然提示在城市考古工作中系统收集辨析文献资料的重要性。

2. 关于地图

大比例地形图是城市考古复原研究最核心的基础资料，但经常需要在不同时代的地图间比较取舍。测绘时代较近的地图，精度较高，能够反映现存地物状态，对调查和发掘工作有较大参考价值。反之，测绘时代较早的地图，精度偏低，但却能够保存业已消失的历史遗迹和遗迹信息，对复原工作也不可或缺。

对辽金燕京城复原研究参考价值较大的几种地图有：

(1)《北京附地》(Peking und Umgebung)，1: 25000，德军1900-1905年测绘，1907年印制⁶。

(2)《北京附近地形图》(马家铺)，1: 25000，北京陆军测量局1913年实测，参谋本部制图局1915年印制⁷。

¹ 《永乐大典》卷四六五〇引《元一统志》：“大觉寺……河桥折而西，有精舍焉。旧在开阳门郊关之外，荒寒寂寞。有井在侧，往来者便于汲，因名义井院。天德三年，作新大邑，燕城之南，广斥三里，寺遂入开阳东坊。大定中赐额曰大觉。”《顺天府志》页12-13，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本，1983年。

²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二，页3087，中华书局，2013年。

³ 此据徐莘芳先生手稿。

⁴ 《永乐大典》卷四六五〇引《元一统志》：“十方万佛兴化院……都城之南郭有精舍焉……天德中，作新大邑，都西南广斥千步，遂隶城中，周垣迫于通衢，复择地景风关，作别院以分处。”《顺天府志》页56-57，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本，1983年。

⁵ (宋)洪迈：《夷坚志》支甲卷一《燕王迁都》：“虏天德二年五月，以燕山城隘而人众，欲广之。其东南隅曰通州门，西南曰西京门，各有高丘，俗呼为燕王冢，不能知其为何代何王也。及其(是)立标埒，定基址，东墓正妨碍，议欲削其北面，以增雉堞。工役未施之数日，都民于中夜时闻人声云：‘燕王迁都，皆出而观之。见銮辂仪卫，前后杂沓，灯烛荧煌，香风袭人，罗列十里，从东丘至西冢遂灭。明夕复然。民以白府留守张君，为请于朝廷，乃迁枉其垒以避之。”页717，中华书局，1981年。

⁶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图，电子扫描本见其网站<http://www.loc.gov/maps/collections/>。

⁷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图，电子本见“中研院近代史所典藏地图数字化影像制作项目计划”网站http://gis2.sinica.edu.tw/map_imh/。

(3)《实测北京内外城地图》，1: 8500，内务部职方司测绘处，1913年¹³。

(4)《实测北平市内外城地形图》，1: 5000，北平市政府工务局，1937年¹²。

(5)《北京四郊地形图》(什方院、广安门、丰台镇、永定门)，1: 10000，约1920年¹³。

上述(1)、(2)比例稍小，但涵盖辽金燕京城内外全境，且测绘时间较早，除金中都城垣保留较多外，明清旧城以外乡野路径也历历可见；(3)、(4)仅为明清旧城以内范围，但比例较大，绘制精准；(5)仅为明清旧城以外范围，比例亦大，可与前两图互为补充。这批地图在以往辽金燕京城研究中利用不多，实际上对于城垣范围、街巷系统的复原可以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

(二) 解释模式

郊野型城市考古中平面图的绘制主要依赖于勘探和发掘手段，虽然工作旷日持久，但复原内容一般均有地层依据，较为可靠。而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则有所不同，复原的主要依据通常来源于对现存遗痕与古代城市之间沿袭关系的判断。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元大都有的明清旧城以北所存元代街巷旧迹作为判定基础¹⁴，南宋临安城有《咸淳临安志》地图和地名作为复原依据¹⁵，但大部分城市则缺乏这些有利条件，使得古今重叠关系的判定存在着较大的推测成份。这些推测通常受到城市考古既有解释模式的影响，而解释模式的形成又往往可以溯源至相关的城市史、建筑史或历史地理的研究当中去¹⁶。对辽金燕京城里坊形态和街巷系统的复原研究也清楚地反映了这种情况。

1. 关于里坊形态

《乘轺录》记辽南京有坊二十六，《元一统志》记金中都有坊六十二，研究者多试图借助那些可以考订方位的燕京辽金寺观，以及文献中所记诸坊与建筑之间的位置关系来推拟坊的排列。关于坊的形态，具有代表性的思路是像岳升阳那样，依照隋唐长安城、洛阳城及其他地方城市复原成例¹⁷，将辽金燕京城的坊也界定为

<1>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图，电子扫描本见其网站<http://www.loc.gov/maps/collections/>。

<2> 侯仁之藏图，影印本见岳升阳主编：《侯仁之与北京地图》页70—83，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

<3> 侯仁之藏图，影印本见前揭《侯仁之与北京地图》页132—203。另有“中研院”近史所藏图，电子本见“中研院近史所典藏地图数字化影像制作项目计划”网站http://gis2.sinica.edu.tw/map_imh/。

<4> 赵正之遗著、徐苹芳整理：《元大都平面规划复的原研究》，《科技史文集》第2辑，页14—27，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

<5> 前揭《南宋临安城复原研究》。

<6> 以中古城市从封闭式里坊制向开放式街巷制转变这一命题为例，在1980年代的正式提出可以视作是将此前以加藤繁为代表的唐宋城市史研究结论与新的隋唐长安城、洛阳城、元大都等考古复原结果相糅合的产物。

<7> 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6期，页409—425、401；前揭《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提纲)》。

齐整的方格式区块¹¹。

但这种复原设想却会遇到难以解释的现象，如：玉阳观，《元一统志》称“在旧城康乐坊”，而《析津志》则称“在敬客坊内”。清和观，《元一统志》谓“在敬客坊南，至元寺之西，真常之北”。至元禅寺，《析津志》谓“在敬客坊南，双庙北街东”。从这几例记录可知，金中都的坊，并非是由街道划分的区块，而是以街道为载体的线条。又如：《析津志》记杜康庙“在南城南春台坊西火巷内、资圣寺西”，崔府君庙“在南城南春台坊街东、火巷街南”。说明南春台坊是南北向街道，而火巷则是与其相交的东西向巷弄。金中都如此，辽南京亦然。《乘轺录》称，辽南京“坊有门楼，大署其额，有颺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坊名也”。所谓门楼，实为主干大街两侧与之相交的分支街道路口设立的坊门标记，前引应县木塔辽代刻经题记即有“燕京檀州街显忠坊门南颊住冯家”字样。

实际上里坊作为城市管理单位，其形态与城市街道规划有所关联但又不能混为一谈。没有证据表明里坊必须为方格式的区块，里坊制的城市也未必是十字街式街道系统。更重要的是，里坊制可以瓦解，但街巷系统并不会随之发生整体性的改变，而这一点恰恰就是古今重叠型城市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

2. 关于街巷系统

街巷系统是城市规划的重要表征。研究者一般认为，辽南京作为唐幽州的继承者，其街巷系统是与封闭式里坊制相联系的十字街式，而金中都扩展的部分，其街巷系统则是与开放式街巷制相联系的纵街横巷式¹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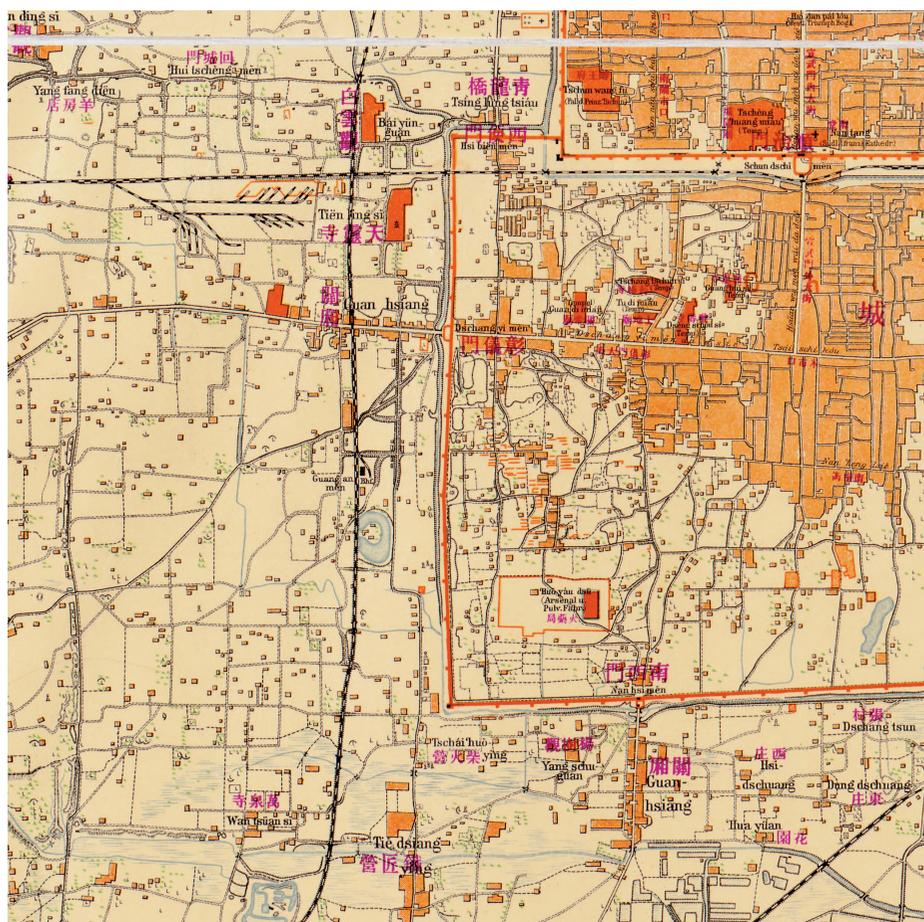
辽南京大半处于明清旧城之内，其街道遗痕隐约可见，确实可以判断为十字街式，城区东半部清晋门与安东门之间大街的南北两侧各由大十字街划分为四大区块，其中某些区块还由小十字街进一步划分为四小区块。这些情况在前文提到的几种地图中表现得比较清楚。金中都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从复原结果来看，对其西南部的街巷系统有两种方案，一种如《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历史地图集》，在端礼门大街两侧各安排一条南北向街道，类丰字结构；另一种如《宣南历史地图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较前者另增南北向街道，类井字结构。从清末测绘的地图《北京附地》[图十六]来看，这一区域的乡野路径结构似有一定规律可循，纵横交错且间距相近，较第二种复原方案的井字结构更为规整，并未体现纵街横巷形态。联系到隋唐长安、洛阳城部分街道与近代乡野路径相重合的情况¹³，金中都西南部的街巷复原对此似应给予重视，并期待在考古发掘工作中进行检验。

〈1〉 岳升阳认为：“在绘图上，坊不但要有确定位置，还要顾及到坊在空间排序上的整齐性。中都城内原唐辽旧城部分的坊，是对唐辽时期坊的继承，体现了唐辽时期坊的排列特征。唐代，无论是都城长安，陪都洛阳，还是地方城市扬州，坊的排列都很整齐，唐辽时期幽州城的坊也不应例外。”《金中都历史地图绘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页84。

〈2〉 前揭《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提纲)》。徐苹芳：《金中都》，《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页23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3〉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页79—93。宿白：《现代城市中古代城址的初步考查》，《文物》2001年第1期，页56—63。

〔图十六〕北京附地 1907



综上，将源自城市史、建筑史或历史地理研究的某些未经实例充分验证的解释模式应用到城市考古复原研究中，将会起到双刃剑的作用，一方面有助于将零散的线索缀合成较为完整的面貌，另一方面也可能因先入为主而使复原产生误差。这一点，应当是在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研究中特别予以警惕的。

2014年10月于吉安永和镇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责任编辑：项坤鹏)